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蜀先主時有本縣長余姓者方少  
年見奉年已三十餘矣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年復  
為他職經侯官諸吏人皆往謁故長奉亦同往余宿識  
奉問曰君莫得道耶昔在縣時年幼松君今已衰白而  
君猶少何也奉曰偶爾後奉游交州州刺史桂熾得毒  
病死已三日奉以三丸藥內熾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  
皆足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但使栽  
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  
林山中群獸遊戲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  
時奉於樹下作一簞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  
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  
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隨後逐之其多取杏即傾覆地  
上虎即還去有偷其杏者至家即死其家速送杏還叩  
頭謝過即活自是買杏更無欺者奉以其所得糧穀賑  
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

# 杏林成蹊集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 研究生 导师



马继兴教授

李经纬教授



余瀛鳌教授

蔡景峰教授

于文忠教授



马堪温教授

王致谱教授

## 研 究 生

(1978—1996)



马伯英



郑金生



胡乃长



赵红军



傅 芳



王 立



郭君双



黄汉儒



伊广谦



郝恩欣



任 旭



黄 健



路京达



万 芳



朱 清



朱建平



张志斌



张 遥



胡晓峰



黄 斌



陈 良



王 珏



王振瑞



杜晓玲



张瑞贤



郭 珍



曹东义



廖 果



漆 浩



潘 平



王友智



黎 云



苏 静



潘桂娟



许志伟



吴厚新



陶晓华



蔡水敏



王凤兰



梁 峻



漾正冈布



李焕荣



肖永芝



陈鸿能



李春兴



张洪林



赵一凡



朱承宰



杨金生



苏 诺



孟凤仙



## 前　　言

医史与文献专业的发展,历来没有专门培养学科人才的学制与设置。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医史学专家与医籍校勘、注释、整理研究专家,并非出自该学科的教育。亦少有专门师承,他们的卓越贡献与精深造诣,几乎无不来自个人或前代学者实践理论经验的积累。因此,在1978年之前,中国医史学、中医学文献专业,根本没有医史文献专业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之学历和学位。

1977年间,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医史文献研究在中受到了医学事业发展中的空前的重视。但当时研究室只有三、五位专家,一无助手,二无设备,要承担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尽快出成果、出人才适应中医工作发展的急需,必须很好解决上述存在的困难。而助手并非调人来便能解决,因为调来或分配来大学生,他们很少能有专业理论与技能,而且几乎没有愿意以此为终身的职业选择。当时,由“文革”刚结束等客观上的原因,我们研究室的几位学者专家还都是助理研究员。我虽考虑过招收研究生途径,但思之再三不敢问津。记得有一次,季钟朴院长找我研究医史文献研究室的发展与科研任务等问题,我提出急需解决助手与条件等困难。院长似乎知道我的心思说,你可以招收研究生。听了院长的意见,说实在的我内心是非常兴奋的、但未敢冒然应允,便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内心的顾虑向院长汇报了。例如:我们还都是助理研究员,怎能招收研究生?我们都没有读过研究生,如何培养研究生?会不会误人子弟?……季院长一次、两次、多次与我谈话,打消我的顾虑。特别是他一针见血地分析指出:医史文献研究室要尽快解决科研人员结构问题,招收培养研究生是当前唯一的最佳选择,院长的这一远见卓识进一步打动了我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在院长提出要我招收研究生时我已经非常高兴地想通了,加之院长一席亲切关注的话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和毅力。1978年我率先面向全国招收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批中国医学史硕士研究生,按计划第一届招生三名,出乎所料,报考者竟多达二十八名,而且他们的考试成绩都很理想。季院长也很高兴,提示我可以报请教委多录取两名。经过严格择优与复试,我们正式录取了五名。1979年又招收文献研究生三名,1978年——1995年间,除1990年未招生外,每年少则一名,多则九名攻读医史、文献学位。与研究生培养同时,医史文献研究室(1982年升格建所)先后获得医学史与中医文献两个专业的硕士、博士授予单位资格。先后有李经纬、马继兴、蔡景峰、余瀛鳌、马堪温、赵璞珊、于文忠、王致谱、傅芳、伊广谦、高文柱等11位获得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1987年——1990年马继兴、李经纬、蔡景峰、余瀛鳌先后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领导下十七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六十位(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与我国台湾各一名博士生)医史、文献硕士、博士(尚有八位在读)。这对一个不足60名人员的小所来讲,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贡献,难得的成绩。

在他们之中,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与奋进,从中颇多精英者,他们在提高医史文献研究水平、教学水平、活跃繁荣国内外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或留在研究所,已经是承上启下的骨干,或已是医史文献的学科带头人,或已走上领导Ⅰ作岗位,为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进行着默默无闻的耕耘。或步入中医药科研出版机构的领导岗位,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奉献着自己

的才干。或与国际中医学史研究、文献研究建立合作关系，扩大中医药国际影响与相互交流进行着深入的探索。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暂时离开专业，但却时时挂念关注着医史文献的发展。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面向国际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及接受美、英等国博士研究生到我所进行为期半年至一年的进修考察等，更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创造了更加广泛的影响。我们相信照此发展下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必将大大提高其在国内、国际的学术地位，这是让我们为医史文献奉献了一生的老一辈非常欣慰的。

医史文献研究生培养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举措，对本学科人才培养的制度化、规范化，为学科建设以及出成果、出人才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成就。特别是全国十多所高等中、西医学院校医史教研室教授相继招收医史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先后培养了医史学硕士、博士近百名，这就在全国医史学界、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大的网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医史与文献学科发展有了新的保证，医史与文献专业必将获得更大的成果，对我国医学科学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国医学科学特别是中医药学现代化等，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看到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出众，十分欣慰。

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领导决定总结本所培养医史学、中医文献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经验，编撰历届毕业生论文摘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外交流，促进两个学科沿着广阔的道路继续发展，并用以隆重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确是富有意义的。研究所领导要我为该集写一前言，我以为借此交待一下前前后后的有关情况，或许是有价值的。

李经纬

1995年10月

# 目 次

前 言	
研究生导师	
马继兴	(1)
李经纬	(2)
余瀛鳌	(3)
蔡景峰	(4)
于文忠	(5)
马堪温	(5)
王致谱	(6)
赵璞珊	(6)
研究生	
马伯英	(7)
郑金生	(9)
胡乃长	(12)
赵红军	(15)
傅 芳	(16)
王 立	(20)
郭君双	(22)
黄汉儒	(24)
伊广谦	(27)
盛维忠	(29)
郝恩恩	(32)
任 旭	(35)
黄 健	(38)
路京达	(41)
万 芳	(44)
朱 清	(46)
朱建平	(49)
张志斌	(51)
张 遥	(54)
胡晓峰	(56)
黄 斌	(61)
鄢 良	(64)
王 珩	(69)

王振瑞	(70)
杜晓玲	(72)
张瑞贤	(75)
郭 珍	(77)
曹东义	(79)
廖 果	(82)
漆 浩	(87)
潘 平	(89)
王友智	(93)
黎 云	(98)
苏 晶	(100)
潘桂娟	(103)
高文柱	(106)
许志伟	(108)
吴厚新	(111)
陶晓华	(113)
蔡永敏	(122)
王凤兰	(125)
梅智胜	(126)
梁 峻	(128)
漾正冈布	(131)
李焕荣	(133)
肖永芝	(136)
陈鸿能	(139)
李春兴	(141)
张洪林	(142)
赵一凡	(142)
朱承宰	(142)
杨金生	(143)
苏 谱	(143)
孟凤仙	(143)
后 记	(144)

# 马继兴

马继兴 男,1925年1月14日生。回族,山东济南人。1941年考入华北国医学院。1945年6月毕业后,在济南市开业行医,同年11月任北京大学医学院生理学助教。1947—48年,兼任《中国针灸学》杂志主编,1949年2月兼任华北国医学院教委会副主任委员兼教授。在此期间,开始进行有关中国医学史的专题研究。1950年10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央卫生部直属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员,同时兼任北京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针灸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北京市针灸研究班教授,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教授,汇通中学校教授及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北京市高级卫生人员考试委员会中医师考试委员,高教部选拔留学生考试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4年10月,参加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工作。40年来,历任该院针灸研究所中医师、学术秘书,医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学术顾问、图书馆名誉研究馆员、研究生部客座教授,北京市联合大学北京中医药学院顾问、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市振兴中医药基金会顾问等职。同时,他还热心学会工作,目前分别担任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药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医基础理论学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主任委员,中国针灸学会文献研究会顾问,中国敦煌中医药国际学术研讨会名誉会长等职。

马继兴先生从事中医科研工作五十余年,著作数十种,论文百余篇。在针灸史、药学史、出土古医书、古佚书辑复、中医文献学诸多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

在针灸史研究方面,自1946年以来,多次撰写修订《中国针灸医学史》书稿,五十年代以后,又潜心于中国铜人的考证研究,多次主持审订和仿制古代针灸铜人的工作,并撰写了《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一书。八十年代后,又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针灸成就的考证研究”。同时还发表了许多有关针灸史的研究文章,如《唐人写绘灸法图残卷考》、《从三种古经脉文献看经络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从考古发掘中所见砭石的初步探讨》、《仿宋天圣针灸铜人》、《敦煌出土的古针灸图》等,在学术界均有很大影响。

在药学史研究方面,50年代便开始撰写《中国本草学源流》书稿,并发表论文十余篇,如《我国最古的药酒制剂方》、《马王堆汉墓医书中药物剂量的考察》、《马王堆汉墓医书的药物学成就》等论文。

在出土古医书研究方面,重点完成了“敦煌出土古医书研究”和“马王堆出土古医书研究”两大课题。撰写出《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获1989年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2年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其后又完成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敦煌古医籍图影及论文集”。马先生始终参加了马王堆出土医学帛书的修复、缀合、补订、释文、考证、命名、注释、语译等工作,先后出版了《五十二病方》、《导引图》、《马王堆汉墓帛书》第四集等著作,同时并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大量研究马王堆出土古医书的论文,均多次被国内外学术界引用与翻译。1987年又以“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书的考证研究”为研究课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研招标项目中中标,并于1990年底完成了《马王堆古医书考释》一书,出版后深受到学

术界的好评。

此外，马先生对全国其它各地出土的古医书也进行了实物考察和研究，并分别撰写出专题论著和研究综述。如《武威汉代医简》、《台西村商墓出土医疗器具砭镰》、《云梦秦简里的法医检验和医政管理》、《藁城台西十四号墓砭考》、《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继敦煌残卷中发现〈内经〉古诊法后的再发现》、《解放后出土文物在医学史的科学价值》、《近年出土的古医书研究》等，都充分反映了本研究领域的最新水平。其中《解放后出土文物在医学史的科学价值》一文，将我国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出土的医药文物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评论。

在古佚书辑复与研究方面，从六十年代着手进行，到七十年代初，编辑了《古佚医学丛书》大型书稿，辑得汉唐至宋初亡佚医籍三百余种，共计几百万字。八十年代初，马先生主持卫生部下达的重点古医籍整理课题“《神农本草经》辑复与研究”，现该课题已全部完成，并通过了专家鉴定，将以《神农本草经辑注》为书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马先生是中医文献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所撰《中医文献学基础》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中医文献学专著。随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充实提高，使之更加系统与完善，更名为《中医文献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以后影响很大，1991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及医学工具书金奖，1992年获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曾於1981年应美国医学图书馆邀请赴美鉴定美藏中医古籍版本，并撰写出《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藏中医药古籍目录》，作为软件输入电脑。1984应日本医学史学会、日本东洋医学会等单位邀请，赴日作专题学术报告。1984年应日本北里研究所东洋医学研究所之聘，赴日作为客座研究员，对日本保存的六朝重要医书《小品方》进行了实物考察，写出了《小品方残卷研究》的论文。1993年应日本针灸文献研究会邀请，赴日参加首届日本针灸文献学会学术大会，以“宋以前中国针灸学通论”为题，作特别讲演。

马先生非常重视培养新生力量，八十年代曾几次组织举办全国或北京地区中医文献进修班。从七十年代末至今，指导培养了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

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院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4年荣获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

## 李 经 纬

李经纬，男，1929年7月16日生。陕西咸阳人。1951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今西安医科大学）外科专业，1955年—1958年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首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本院医史研究室，在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的指导下，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工作，1971年，医史研究室与文献资料研究室合并，负责组建医史文献研究室。1976年正式任主任，1979年开始，负责筹建医史文献研究所，任副所长。1982年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正式成立，任命为所长。1985年，晋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医史博物馆名誉馆长。

李氏在近四十年的医史科研中，为发掘、彰明中国传统医学诊疗技术之创造发明，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学术研究工作大约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6年以前，参加《中国医学史简编》的撰笔调稿，发表论文20余篇，外科史为其研究重点，其《中国古代外科成就》一文，以丰富的史料、精辟的分析，受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好评。同时，对隋

唐医学史、疾病史、医家、医著也进行研究，写出《孙思邈》等论著。第二阶段为“文革”十年，李氏仍坚持工作，先后参加《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的编写、《武威汉代医简》、《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的研究，前者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两次荣获卫生部1982年乙级科研成果奖。1974年受院领导委托，作为编委，办公室主任，筹备、起草编写计划和体例等，与兄弟单位合作，成功地完成了《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的编撰。第三阶段为1976年至今，除继续深入研究外科史、隋唐医学史外，研究领域更为拓展。一是重视医史理论的研究，如其论文《关于医学史家学术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医学》等，引起学术界、医史界的重视，并为《新华文摘》转载。二是研究国家医药卫生政策与医学发展的关系。如《传统医学与政策》、《北宋皇帝与医学》一文，引起中外学者的瞩目。此外，对中医养生学、骨伤科史、医学教育史、医疗技术史等也有新的研究。发表论著80余篇。10多年来访问了日、美、英、德、泰、加及我国台湾等十余次，交流上述论文，获得良好的反响。主编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中医人物词典》、《中华文明史·医学史》，著有或全作著《中国古代医学史略》、《中医常作工具书手册》、《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古代的中国医学》等近20种。现任卫生部《中国医学通史》（古代、近代图谱卷）常务副总编兼古代卷、图谱卷。

自1978年始，承担培养医学史研究生任务，迄今已有15位硕士生、博士生毕业。1993年面向国外招生，现有新加坡、台湾、韩国等国内外博士研究生七人在读。1979年，同仁一起，促成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并先后任复会后第1—4届中华医史学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副总编、总编至今。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我院历届专家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医史文献分委会副主席。1992年，被聘为首届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大陆协助委员会主委。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余瀛鳌

余瀛鳌，男，1933年2月27日生。江苏阜宁人。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字。1955年7月任中央直属第二医院住院医师。1956年12月参加卫生部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1956年拜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为师，并受其父余无言先生及诸名家亲授），于1958年以优异成绩结业，后分配至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后改名中医文献研究室）工作。1982年中国医史文献研院建立后，一直工作迄今。1985年晋升为研究员，先后曾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等职。

38年来，余氏以研究中医临床文献为主，致力于内科、妇科的古代临床文献研究，并撰著中医学和中医文献辞书。为中医临床文献学科带头人，对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其中临证，博采诸家之长，方不拘经方、时方，择善而从。余氏主张辨病（包括中西医病名概念）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对于进一步常见病，着意于探求“删繁就简”的规律，反对过于繁复的病证分型。多年来，余氏注重于若干疾病的“通治方”研究，力求拟订切合病症之基本病理、病机和便于推广应用的通治效方，对某些病证的不同临床表现，用“通治方”加减以体现施治中的“同中之异”，便于学习，便于对外交流，也较易寻觅一些疾病的证治规律，其于内科，对肝肾、泌尿生殖系疾患、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肺炎等病尤为专擅，兼治妇科，长于崩漏、不孕等病证。其临床方治已被收入《名医名方录》、《当代名医证治汇粹》等多种医籍。

在教学方面,17年来,余氏先后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共指导中医文献硕士研究生16名,博士研究生2名,并在所内主办的历届中医文献及医史高级进修班、院研究航天部,担任文献及中医专题讲座课程,对培育后继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余氏著述丰富,早期有《(重订)内经类证》之作,后又编撰《现代名中医类案选》(日文版名《名医临床例选集》)、《金匱要略语译》等书,主编或参与主编《常见病验方编》、《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新编中医辞典》、《中医古籍珍本提要》、《中医文献辞典》、《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等书,领衔点校或审订多种古医籍。其中《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获全国医史文献及医学工具书评委会金奖,《中医名词术语选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发表中医学术论文180篇,在中医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部客籍教授,并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新安医学研究会顾问、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评委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会委员)、《中医杂志》特约编审、北京社会福利偏瘫医院顾问、美国安德生抗癌中心顾问等职,1992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已将余氏收入《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是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蔡 景 峰

蔡景峰,男1927年7月生,福建厦门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5年毕业于福建集美高中,1954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本科,1958年结业于卫生部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

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中医研究班结业后,即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研究医学史至今。

在研究工作的前阶段,主要对中国医学通史》(重点为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医史人物评价、疾病史、专科史进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后一阶段研究兴趣转向我国少数民族医学史,重点研究藏医学史。在民族医史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并在中华医史学会学术年会上提出我国民族医学史研究正在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论点,从而促进了我国民族医学史学科研究工作的形成和发展。198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建立民族医史研究室,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由他主持工作至今。

在一般医史文献工作中,除撰写大量学术论文外,还参加主编许多大、中型工具书,包括《中医大辞典》、《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主编、《中医人物词典》等。在民族医史方面,有著、译多种,其中《西藏医学》、《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藏英版)、《西藏传统医学概述》等不仅在国内均为首见,在国际学术界也受到重视。获得好评。其中的一些著作曾分别获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及其他全国性专著为金、银质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他任负责人的科研课题《四部医典文献学研究》获199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专著尚有《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中国传统食疗》(英、法、意文本)、有较大影响,有关医学史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字数在百万字以上,发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受到学术界重视。

在研究工作中,主张贯彻中西医结合观点,有较大国际影响。多次应邀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学术会议和讲学,并应聘美国东西方中心任客座研究员,到德国乌姆大学为客座教授。现为国际学术半月刊《社会科学与医学》中国地区大部,美国《医学地理学传统》期刊编委。

其名字已收入 1993、94 英国剑桥传记中心编加的《国际人物传记辞典》(二十二版),还应聘任该中心顾问委员会名誉顾问。

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常委,中华医史学会民族医史专业组组长,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地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医外语委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然科技史)委员,《中华医史杂志》副主编,《中华本草》民族药专业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医杂志》编审、《中医杂志》(英文版)特约编审,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编委,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学位委员会委员,并曾被选为首届国际中国医史学术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第三届亚洲传统医学国际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2 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 于 文 忠

于文忠,男,回族,1928 年 5 月 22 日出生辽宁锦州。研究员。1951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外科专业。自 1958 年第一期中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后,即从事中医外科临床工作。对中医外科诸如软组织炎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胆道疾患、颈淋巴结核等常见病进行临床研究,后者于 1984 年获院三等成果奖。曾为北京医学院 73 届、本所三期文献研究班及一期医学史进修班学员系统讲授中医外科文献及外科发展史,1983 年开始招收硕士生。长期来对中医外科古典文献进行系统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刘涓子鬼遗方》在外科方面的成就、从有关文献看我国古代骨伤科的发展等数十篇,译文 10 余篇。在整理古医籍方面,校勘、辑佚了《刘涓子鬼遗方》、《卫生易简方》、《杨氏家藏方》等,参加编著《中医外科证治经验》等著作。总之,能卓有成效地运用中医理论,指导并完成中医外科临床、教学与文献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具有较高的水平。

## 马 堪 温

马堪温,男,1927 年 1 月 1 日生。北京人。1950 年燕京大学毕业,学制五年(前一半在中文系,后一半在西文系)。1960 年至 1962 年结业于北京医学院西学中班,从 1954 年起先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中医进修学校、铁路医学院等单位的西学中班中医史课程,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史师资科教骨干进修班、研究生班的中、西医史专题讲座。曾担任卫生部主办的涉外班中国医学史讲课。1978 年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医学史硕士导师之一,先后指导硕士生三名。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医史专业研究四十余年,对中外医学发展的历史有系统广泛的知识。治学严谨,注重实际调查。从 1954 年开始,对我国部分古代名医的生平业绩等进行了研究和实地调查。经研究的人物有扁鹊、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刘完素、朱震亨、王肯堂、虞天民等。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有关故里、遗迹的资料。“文革”后,许多名医的遗迹遭到破坏,这些 50 年代调查所得的资料弥足珍贵,是现代研究医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由于熟谙中、英、俄等文字,故在国外医学历史资料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医药外传(东方及欧美)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并批驳了外国学者对中医学的某些错误论断(如关于针灸的作用、否定华佗是中国人等)。曾撰文探讨王叔和脉诀对阿拉伯及

欧洲的影响,提出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世界儿科史上的第一部最系统的专著等。在中国医学通史的研究方面,以对明清医学历史的研究见长,对中医针灸、产科等专科亦有较深入的研究。为了扩大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经常在国际学术会上和专刊上发表论文。如1980、1982年先后在日本东西方比较医学史学术会议上宣读“中国公共卫生史”、“古代产科史”等论文、80年代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地,用英语做关于中国医学史、针灸学史、中医教育史等方面专题讲座,为在海外弘扬中国医学做出了贡献。1986年与德国文树德教授等共同努力,建立了国际东亚传统医学会。1989年赴英国威尔康(Wellcome)研究所工作,至今在海外为传播中医学而努力。

马先生工作极为勤奋,著述甚众。共发表医史论著、译述100余篇,翻译医史著作十余部。70年代以来,参加了数部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医名词术语选释》(单语部分)、《简明中医词典》(历史人物)、《中医大词典·医史分册》(明、清人物)、《医学百科全书·医史分卷》(副主编及中西医史条目的撰写)、《汉英医学常用词汇》(中医部分)、《汉英医学大词典》(中医、医史文献主编审之一)等等。

## 王致谱

王致谱,福建人。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工作,在陈邦贤老师指导下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后于1970年赴西北农村从事医疗工作。十年动乱结束后回京,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科研工作方面,先后完成疾病史、近代名医传记等论文数十篇,并参加中医工具书编写和古籍校刊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医人物词典》、《现代方剂手册》(合作编写)。近几年主要研究课题是编写近百年中医发展史,担任《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副主编。

## 赵璞珊

赵璞珊,男,1926年生,出身中医家庭,幼随父心波习医。1949年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华北各大学暑期学习团”学习后分配至中宣部资料室任资料员,继在《学习》杂志社社任编辑。1957年调入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工作。1958年参加卫生部办第二期西医学中医班学习。1959年结业。1971年,甘肃武威汉代医简出土,曾应邀研究。1972年奉卫生部派遣参加湖南马王堆出土女尸情况调查。其后,又于1974年参加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研究。武威汉代医简和《五十二病方》之研究,获卫生部乙级成果奖(第二作者)。个人并发表“五十二病方药证稽要”、“汉墓中的白膏泥和木炭”、“马王堆出土竹简《十问》的著作时代初议”等文。1976年参加赴西藏学习研究藏医小组,为时半年归来后发表了“藏医源流和特点”等文。其他尚有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金元四家、张景岳、吴昆、方以智诸家的学术成就,中医儿科学术贡献,以及近代医学在中国之发展等论文60余篇。著有《中国古代医学》一书,1987年和1992年,两次为日本泷川严医学译成日文,并自印成书。

自1985年后任研究员,1991年兼任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研究员。此外,还曾任《中国通史》古代卷副主编、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主持编写的《世界百名著大辞典》中医卷主编,并获政府特殊津贴。

# 马 伯 英

马伯英，男，1943年生，浙江东阳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从事中西医临床；入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专攻医学史，获硕士学位；建上海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任主任，并任中华医学学会医史学会委员、《中华医史杂志》编委等职。为九三学社社员。1985年赴英聘为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合作者；继而为剑桥大学科学哲学史系高级访问学者，并被选为该校 New Hall 学院高级院士（访问院士），1988年曾再度赴剑桥与李约瑟博士合作，并为 Hughes Hall 研究生院访问院士，英国学术院 K.C.W. 院士。现为上海医科大学教授、上海医学辩证法学会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顾问。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有《中外医学史》《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译著有《世界医学五千年》等，为国际著名医史学者。

通讯地址：上海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邮政编码：200032。电话：(021)4041900—327(0)5180940(H)

## 试论祖国医学基础理论奠定时期的认识论与方法特征

1978 年级硕士生：马伯英 导师：马堪温

医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是探索医学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祖国医学从其原始形态到基础理论形成——以《黄帝内经》为标志——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均颇具特征。

(一) 中医学的认识论基础，是我国土地上自原始人群即开始的生活、生产、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积累和总结。过去有人因为我国早期历史上存在过相当长的“巫医”阶段，因此提出了“医源于巫”的论点。近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人们的医疗活动，早在巫医出现以前已经存在。出土石器中有砭石、骨针；甲骨卜辞中有砭石或草药等治病的记录。这类文字既记录于甲骨卜辞中，其存在则可推测大大早于占卜术本身。这样的巫术泛滥的历史阶段中，“巫”一度统治了“医”，利用了“医”，并在利用的同时在某些点上，发展了“医”，这是辨证统一的。

巫术的唯心主义宗教体系，最后必然限制了属于唯物主义范畴的医学发展。因此，直到周代以后，医学突破了巫术的控制，我国古代医学才得到了新的、大的发展。

有人或以动物之有救疗本能而论“医源于动物本能”。这是一种误解。其不妥在于将人类从动自疗活动中得到的经验借鉴，扩大化地看成了人类医学生长的起始点。动物本能行为在人类中只存在于婴儿期，动物中也未见其进化阶梯愈高，其救疗本能辄愈大者。这是人类学和动物学研究中所得的结论。同理，“动力的医学”绝不可能自生自长为人类医学。

探究甲骨文字和周秦典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我国医学经验积累而得进步的资料。甲骨文字对人体体表部位、某些内脏，作了象形的构架结字。由中可看出当时人们对解剖知识的了解。除了医疗经验的积累，医学的发展必须具有形态学的基础。中医学的理论，在其后发展中